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

从毛泽东、邓小平 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CONG MAOZEDONG DENGXIAOPING
DAO SANGEDAIBIAO ZHONGYAOSIXIANG

增订版 下 册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组编

王 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组编

王 东 著

从毛泽东、邓小平 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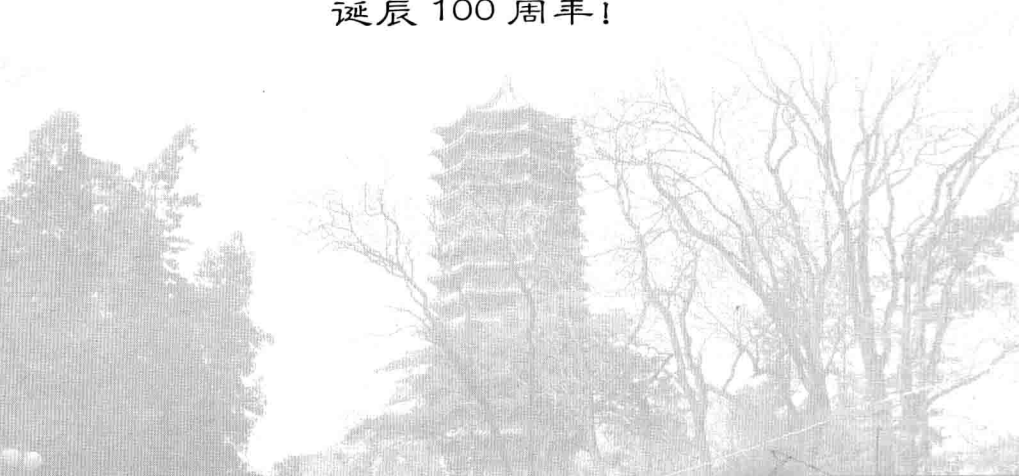
CONG MAOZEDONG DENGXIAOPING
DAO SANGEDAIBIAO ZHONGYAOSIXIANG

增订版 下 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谨以此书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诞辰 100 周年！



下 册

第十七章 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协调机制论	(443)
第一节 现代化求索的不惑之道	(445)
第二节 现代化——宏大目标	(447)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保证	(451)
第四节 改革开放——革新之路	(454)
第五节 “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 三位一体	(458)
第六节 把握大局的关键问题	(462)
第七节 最为根本的历史经验	(464)
第八节 三者统一的协调机制	(469)
第九节 稳定经济的四大尺度	(471)
第十八章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控制数量、提高素质 双管齐下论	(479)
第一节 中国人口问题：关键地位与十个难题	(481)
第二节 人口爆炸超前，经济起飞滞后 ——中国近现代化失机的三次历史教训	(486)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历史教训与可贵探索	(493)
第四节 生产力革命和人口革命 ——中国现代化的双翼起飞论	(498)
第五节 控制人口的一道防线，提高素质的积极方针 ——双管齐下的“人的革命”	(503)
第十九章 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关系：中国资源节约型 发展道路论	(507)
第一节 中国资源的独特矛盾	(507)
第二节 土、水、林、能——中国四大稀缺资源	(512)
第三节 中国资源节约型新发展道路的六大原则	(516)
第四节 资源节约原则	(519)
第五节 开源节流原则	(522)

第六节	天人平衡原则·····	(526)
第七节	探测先行原则·····	(529)
第八节	综合利用原则·····	(535)
第九节	精心保护原则·····	(538)
第二十章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天人和諧新型	
	生态文明论 ·····	(543)
第一节	中国生态问题的三大特点·····	(543)
第二节	生态环境:劳动实践的外部前提与自然基础 ——新实践论·····	(548)
第三节	防患于先和综合治理·····	(553)
第四节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560)
第五节	天人和諧的新型生态文明 ——天人关系的三大历史形态·····	(568)
第二十一章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综合创新论 ·····	(575)
第一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化创新的九大成果·····	(576)
第二节	三大问题的理论反思·····	(582)
第三节	中华文明的综合创新与现代复兴·····	(587)
第四节	21 世纪世界新型文明的东方曙光·····	(597)
第二十二章	科技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科技创新龙头论 ·····	(599)
第一节	科技创新论源头在哪里 ——马克思与熊彼特比较研究·····	(599)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中的古今中外法和综合创新论·····	(607)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中的综合创新文化观·····	(626)
第四节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教兴国论与 全面创新论·····	(637)
第五节	四元综合的创新主体论·····	(650)
第六节	多元综合的创新体系论·····	(651)
第二十三章	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关系:“三个代表”的 党建创新关键论 ·····	(658)
第一节	马克思 19 世纪 40 年代两大创新:唯物史观和 《共产党宣言》·····	(658)

第二节	列宁最后构想的三大创新:文化革命、 新经济政策、党的创新	(662)
第三节	党的建设:毛泽东思想中的三大法宝之一	(669)
第四节	关键在党:邓小平理论重要支点	(671)
第五节	世纪之交的世界历史性大转变	(675)
第六节	多重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	(684)
第七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690)
第八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692)
第九节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694)
第十节	用人民监督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实 ——防治官僚腐败的根本途径	(696)
第十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 ——党的建设创新关键论	(715)
第十二节	经济建设是重心,党的建设是关键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最新实践经验	(719)
第十三节	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的领导权与政权合法性根据	(721)
第十四节	三大振兴的历史使命	(723)
第十五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	(727)

第四篇 十六大以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发展

——中国新发展观与和平崛起之道

第二十四章 中华复兴的伟大纲领

	——十六大的七大理论创新	(744)
第一节	历史铺垫:执政兴国基本经验论	(744)
第二节	宏伟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	(747)
第三节	领导核心:“三个代表”的党建创新纲领论	(750)
第四节	哲学基石:与时俱进、全面创新论	(752)
第五节	经济基础:现代新型中国工业化道路论	(755)
第六节	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	

	政治文明论·····	(756)
第七节	文化奠基：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主旨的 文化创新论·····	(757)
第二十五章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三大源头与三大创新·····	(759)
第一节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核心理念·····	(759)
第二节	以人为本是西方发展观大趋势·····	(765)
第三节	中华智慧中以人为本思想的优秀传统·····	(781)
第四节	从急功近利到以人为本 ——政绩观上的根本创新·····	(795)
第五节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 ——发展战略上的重大创新·····	(801)
第六节	从权力本位、金钱本位到以人为本 ——价值本位的根本创新·····	(807)
第二十六章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	(819)
第一节	统筹城乡发展：新重农论·····	(819)
第二节	统筹区域发展：多元一体腾飞论·····	(827)
第三节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双翼起飞论·····	(841)
第四节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天人一体发展论·····	(845)
第五节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双轮互动加速论·····	(850)
第二十七章	科学人才观 ·····	(857)
第一节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857)
第二节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859)
第三节	人才培养机制创新·····	(861)
第四节	人才评价使用机制创新·····	(863)
第五节	人才流动市场机制创新·····	(866)
第六节	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创新·····	(867)
第七节	重点确立高级人才培养机制创新·····	(869)
第二十八章	和平崛起的中国战略机遇观 ·····	(873)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针对对象：中国威胁论与	

中国崩溃论·····	(873)
第二节 战略机遇期和国际大环境·····	(877)
第三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科学内涵·····	(883)
第四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	(887)
第五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	(893)
第六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	(895)
第七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三步走”方略·····	(899)
第八节 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中国和平崛起观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901)
第九节 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903)
后记·····	(908)
增订版后记·····	(910)

第十七章 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协调机制论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从总论部分转入分论部分。这两部分的关系是“以纲带目”：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深入研究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时代课题，特别是江泽民同志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中国现代化起飞过程中的四个全局问题、关键问题；其中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是总揽全局的基本方针，中间讲到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的两大转变，最后落脚到现代化文化建设与党的建设。

这一章的中心是，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三者之间建立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协调机制。从 1997 年下半年以来，在东亚周边国家经历了风靡一时的金融震荡之后，我们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意义与深远意义。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复杂辩证关系，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把正确处理三者关系作为统摄全局的基本方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亟待解决的十二个重大关系中，列在首当其冲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跨世纪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复杂辩证关系，的确是一个影响全局、决定成败的首要问题、关键问题、根本问题。

因此在这里，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于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的这个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基本方针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专门研究。为了达到把改革动力、发展目标、稳定前提统一起来的目的，

这里提出了三者关系上的协调机制论,或者更具体点说,就是“稳健系统改革—适度持续发展—长期积极稳定”的协调机制论。

我在这里分三个层次,逐层深入地论证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机制论。

第一层通过总结改革开放 20 年、新中国建国 50 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建立协调机制,其深层基础与深层根据,是正确把握“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三者关系,是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三者关系。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抉择中,我们必须把握这三大要素、三大支点的有机统一: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改革开放根本途径。正确把握这个历史契机的一把思想钥匙,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亲自确立的这个“战略布局”,是邓小平理论展开的这条基本思路。

第二层通过对比研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大曲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进一步论证处理好上述三者关系确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所在。前者走的是先“左”后右的两条死路。“左”的教条主义僵化死路,问题在于多年来长期固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稳过了头,失去了改革机遇,也失去了发展机遇。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死路,问题在于根本撇开稳定的前提和发展的目标,先是搞“休克疗法”,后来又根本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最后必然导致国家解体、社会动乱。

第三层则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具体探讨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协调机制建立的黄金尺度和破裂的临界尺度。从性质上看,改革应当是可控系统的改革,而不是激进失控的改革;发展应当是适度加快的可持续性发展,而不是大起大落的非持续性发展;稳定应当是长期积极的内在稳定,而不是一时强制的表面稳定。从数量上看,为了寻求“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稳定程度”有机结合的恰当尺度,这里提出了四道杠杠作为安全线和临界点:

第一,保持“八九不离十”的经济发展速度,让经济增长以每年百分之七八为中轴,以上下浮动不超过百分之四为佳,增长速度过高,大幅度超过百分之七八、乃至百分之十则难以为继,增长速度过

低,大幅度低于百分之七八则失去起飞势头。

第二,通货膨胀率最好控制在4%以内,特别是要严格控制在10%以内。

第三,城镇职工失业率在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要控制在3%以内,在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发展时期要控制在5%以内,在国有企业加大改革力度的特殊情况下,名义失业率应控制在10%,实际失业率则应控制在5%。1998年上半年我们的失业率已经达到这个临界点,必须高度重视,谨慎对待。

第四,农业工业发展速度比最好控制在1:2左右,速度比最大也不要超过1:4这道警戒线。

第一节 现代化求索的不惑之道

新中国建国50年、改革开放20年,中国的发展、社会进步举世瞩目。总结我们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新道路,努力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大目标。其中现代化是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制度保证,改革开放则是根本途径。如果失去中国现代化这个民族主体性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就会被扭曲变形为僵化模式,改革开放就成了单纯向国际资本开放市场。“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支撑的三大支柱,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有机统一的内在根据。三者内在关联,不可割裂,合则皆全,偏则俱失。坚持三位一体,是当前保持稳定、改革、发展三者协调的最重要的深层基础。

在中国经济起飞期、体制转轨关键期和社会现代化临界期的融会点上,我们先后迎来了新中国建国50周年、改革开放2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

为了顺利走出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目标,而又避免许多东西方国家曾经发生的大动荡、大曲折,中华民族强烈地呼唤着一种“面向新世纪”的活智慧、大智慧、新智慧,呼唤着一种超越以往东西方传统的政治智慧、历史智慧、哲学智慧。因而,我们思想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南,从现代化角度和理论思维高度,对于建国 50 多年、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历史经验,作出认真总结和理论升华,以便高屋建瓴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中国现代化目标问题、方略问题、体制问题,更加自觉地迎接 21 世纪的中华腾飞。

几千年前,在人类文明社会史的第一个关键期,孔夫子富于哲理地论述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把 30 岁作为“而立之年”,而把 40 年作为“不惑之年”。这里的深意也许在于:只有经历长期曲折的上下求索,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基;只有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才能升华到大彻大悟的“不惑之道”。

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与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之间,有时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50 年来的历史,走过了“高——低——高”的曲折历程,最终找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建国之初的头八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雄才大略,以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社会主义改造论为指导思想,迎来了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壮丽日出”;从 1957 年起到 1978 年的 20 年,“左”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逐步抬头,苏联式的僵化模式逐渐占了上风,在经历十年曲折发展之后,一度误入十年动乱的死胡同,中国现代化遭受了严重曲折;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20 年间,以邓小平同志为杰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改革开放,锐意革新,励精图治,迎来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水流千转归大海,奔腾上下不复回!

可以说,新中国是在建国 30 年之际,才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而立之途”;新中国又是在建国 40 年之后,才最终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统摄全局的指导思想,才找到一条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的“不惑之道”。这是一条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上下求索、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后所确认并全力以赴的道路,它使人们在方向上不会迷惑,在信心上不可动摇,在步骤上不会混乱。

综观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尤其是建国 50 多年、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风风雨雨,把我们的基本经验、基本理论集中到一点,就

是：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努力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大目标。

在这里，现代化是伟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制度保证，改革开放则是成功之路。因而可以说，“现代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三位一体原则，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理论支点。为了在体制转轨关键期，确保稳定、改革、发展的三者关系协调机制，我们必须十分珍惜这一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二节 现代化——宏大目标

在步入 21 世纪之际，中国与世界不仅呼唤着新时代的工具理性、方法理性，而且更加强烈地呼唤着新世纪的价值理性、目的理性。

在如何确立中国现代化目标这个时代课题上，建国后自始至终贯穿着三个焦点问题：

其一，是以现代化建设为重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目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总纲，把变革生产关系继续作为中心任务？

其二，是基于中国贫穷落后的国情，具体分析中国现代化特有的长期性、渐进性、阶段性，还是追求现代化的速成性、跃进性、一步性？

其三，是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全面性、整体性、深层性，还是把现代化目标表面化、简单化、单一化？

建国 50 年、改革开放 20 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理想追求不断走向明确化、具体化、系统化的曲折发展历程。

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中“高——低——高”的历史三部曲，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魂系“飞天”，追寻现代化目标，螺旋上升的三部曲。

建国初期的头八年，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取得成功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一开头就较为明确、科学、深刻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目标问题。

在这方面，有三大成功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成功经验之一，是从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到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直到过渡时期总路线、《论十大关系》，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始至终把中

国工业化、现代化,作为统摄一切的首要目标。

成功经验之二,是充分注意中国现代化所特有的长期性、渐进期、中介性,善于寻找、创造各种中间环节、过渡措施、中介桥梁。

以建设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为主题,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有三大创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既适度发展、积极利用又适当限制、循序改造的国家资本主义;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灵活多样、循序渐进的农村合作制。^①

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为主题,新中国在政治建设上也有三大创造,旨在寻求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党的领导与人民监督的结合点: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制;多党政治协商制;人民代表大会制。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新中国的奠基者,也颇多建树,提出了色彩斑斓的建国蓝图和独具个性的闪光思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当时作为后起之秀、政治新星而参与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人民监督制克服官僚腐败的光辉思想,陈云同志则提出了“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新型体制构想。这真是一个群星灿烂、大展宏图的时代!

这些适合国情民心的稳步渐进措施,既保证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主导方向,同时又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的重大改善。

成功经验之三,是开始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初步注意到现代化过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一系列闪光思想;中国现代化是国家工业化与农村社会化的有机综合;是物质技术基础与社会关系形式双重改造的有机综合;是社会经济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有机综合;是制度改造与人的改造的有机综合。

开国之初,短短八年,在现代化目标问题上所取得的实践经验和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10页。

认识经验,毕竟还只是初步的,还留下了一些未能完全解决的理论难题,为后来的曲折道路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的低潮时期,是从1957年到1978年这2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也有高峰和成果,但总的趋势却是曲折发展,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现代化目标的偏离、模糊、动摇。可以说,开头十年颇有建树,而后来的十年却是低谷时期,主要有三大历史教训:

第一个重大历史教训,就是究竟是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工作重心问题上,发生了严重逆转。开头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把斗争锋芒扩大到一批知识分子;其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斗争,斗争矛头进而扩大到彭德怀等党内干部;最后在1966年演化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全面动乱。

第二个重大历史教训,就是企图用“大跃进”的方式,一下子达到现代化目标,认为只要苦战三五年,钢产量翻几番,就能超英赶美。结果,“大跃进”成了大折腾,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大破坏。

第三个重大历史教训,就是把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多少有些简化,未能看到这个历史变革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总的说来,这20年间的头十年,毕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十年,全面建设、曲折发展是其显著特征。而这十年又可分为两段,大体上以1961年为界,前面是逐步走向“大跃进”的头五年,后面是国民经济调整发展的五年。从中国走向现代化角度看,60年代初这五年,有三件很有意义的大事:第一件是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第二件是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中央领导同志支持安徽农民“包产到户”的首创精神,实质上开了中国80年代农村改革之先声;第三件是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思想,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①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丰碑。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左”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抬头;甚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9页。

至一两年之后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如果从指导思想高度来寻找理论根源,那么也许应当指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具有当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这就是把主要视线都集中于物质技术基础层面的现代化,而对更深层次上的体制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却未能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

从现代化角度看,这个20年,总的说来是走向低潮时期,但又都不是低潮,而是低中有高。确切说来,应分为前后两个十年:头十年是全面建设、曲折发展的十年,后十年是严重逆转、社会动乱的十年。为什么会从头十年逆转到后十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从指导思想上解决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第三阶段的又一个高潮期,是改革开放的20年。这20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最快、最好,能基本保持持续发展的20年,也是现代化目标不断走向明确化、科学化、系统化的20年。这一时期,经过反复实践,反复比较,终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之中,根本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三个焦点问题,积累了大量新鲜的历史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条:

第一条新鲜经验,是坚决摒弃僵化模式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把发展生产力、加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作为高于一切的首要目标。要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紧紧扭住这个中心不放,即使遇到了像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的剧烈事变、大风大浪,也“处惊不变”,毫不动摇。

第二条新鲜经验,是彻底放弃中国现代化“大跃进”和“速胜论”的指导思想,根据中国特殊国情,树立分阶段、有步骤、渐进式的“持久战”科学方略,确立一套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20世纪后期,初级目标是脱贫致富奔小康;到21世纪头30年,中级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期,建国一百周年前后,高级目标是使中华民族接近中等发达水平。^①

第三条新鲜经验,是努力克服“单打一”的现代化目标模式,逐步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接近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全面性、整体性、深层性。改革开放 20 年,就像历史缩影一样,集中映现出近代 150 年来人们对现代化目标的认识深化进程,从外到内,从表到里,从浅到深,从单一到整体,从抽象到具体。迄今为止,至少触及了以下五个层面上的现代化,从而使现代化观念在深度广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单项实物指标的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层次的现代化、社会制度运行机制层次上的现代化、文化观念层次上的现代化、社会主体层次上人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作为一条红线,一种内在规律,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成为一种内在深层的驱动力、统摄一切的普照之光。我们不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改革开放,都要紧紧扭住中国现代化这个大目标不放,不能离开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点。如果我们失去了中国现代化这个民族主体性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就会被扭曲变形为僵化模式,改革开放就成了单纯向国际资本开放市场。

建国 50 年来,“两头高、中间低”的历史轨迹,都和能否紧紧抓住现代化这个大目标、大主题息息相关。建国初期的头 8 年和改革开放 20 年的两次高潮,高就高在紧紧抓住了一个中心,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这个人目标、大主题,真正做到了纲举目张、统摄全局。中间 20 年的曲折发展、低潮时期,低就低在模糊、动摇了中国现代化这个大方向,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摆到了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保证

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无数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式资本主义工业化、私有化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社会主义是理想目标,我们在这里侧重探讨它对现代化的制度保证作用。

从全球史观的大视角看,一个民族要实现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许还可以走一种既非纯资本主义又非纯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有一定的选择空间、